

◎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

许地山——

# 东方学者型作家的“世界之旅”

张艳丽

许地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独特的作家，曾留学于英美，游历于新加坡、缅甸、印度等地，毕生致力于东方文化、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在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建树。许地山的文学创作独树一帜，其散文《落花生》广为人知；他同时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与海内外知名学者有广泛的交游；他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身先士卒。许地山一生践行求实、奉献、牺牲的精神，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尊重。

近年来，许地山的文学成就、学术业绩、精神品格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在国内，2021年10月，重庆召开了“落花生·许地山”——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暨纪念许地山先生逝世80周年座谈会；在海外，许地山的作品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其精神内涵与价值也日益得到海外学界和读者认同。

## 海外译介趋向多元

据不完全统计，许地山作品至少有日语、俄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6个语种的译文。上世纪30—50年代以日译名作为主，60年代出现俄译本（1961年，《萤灯》被译成俄语），70—90年代日译内容逐渐丰富，21世纪后出现多语种译文。

许地山生前有3篇小说、1篇论文译成日语，分别是《在费总理底客厅里》（T.K.1930年译）、《命命鸟》（池田孝1934年节译）、《春桃》（松枝茂夫1939年译）、《庙宇祠堂与民间生活》（堀内正夫1940年译）。1941年，许地山去世后，日本《中国文学》就此进行报道，并连载了千田九一翻译的《黄昏后》《商人妇》及介绍文章《落花生（缀网劳蛛）》。1947年，千田九一对小说集《缀网劳蛛》（内含《黄昏后》《换巢鸾凤》等5篇小说）的翻译，向日本读者展示许地山作品的魅力。

上世纪80年代后，日本出现了《归途》（户崎哲彦1980年译）、《命命鸟》（松冈纯子1990年译）、《铁鱼底鳃》（武田雅哉1992年译）、《缀网劳蛛》（代田智明1993年译）等译本，带动了日语界的许地山研究。日本福冈市中国书店2000年发行的日文版《落花生之梦——许地山作品集》（松冈纯子编辑译注）收录许地山13篇作品的26种译本，是比较完整的一部许地山作品集。此外，日本CiNii数据库可检索到《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许地山》《神秘奇特 异域情韵：许地山小说全集》《许地山代表作》3部许地山作品集。

新世纪以来，多语种、多门类译本的出现，表明许地山作品的海外译介开始走向多元化。2007年，张培基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英译《落花生》并附许地山简介。2008年，法国鸿飞文化

◎新作评介

## 青春是出门远行 ——评周洁茹《美丽阁》

尹林



《美丽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潜身的周洁茹变得更淡了，有一种率真洒脱。如果说7年前，周洁茹试图写女性青春的某种普遍性，现在，她已不再刻意追求什么。《美丽阁》似乎是一个堡垒，守护的是作家百般犹豫、始下决心的重新写作。这种写作的唯一障碍就是瞻前顾后。所以周洁茹这次出手，可以说是“删繁就简三秋树”，从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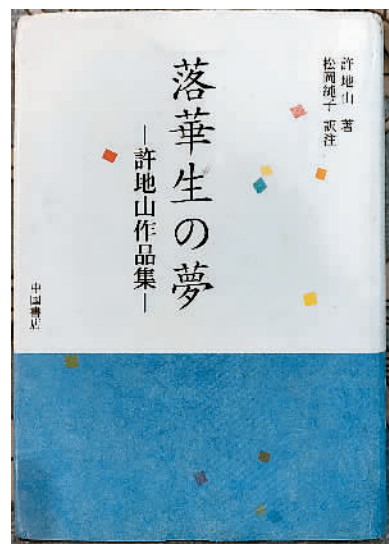
出版社出版法语版《再会》与《爱流夕涨》。2021年，《商人妇》被译成意大利语，《春桃》被译成西班牙语。纵观许地山作品海外译介由兴起、低落到高潮，再到多元化的历史流变，可以发现其海外传播前期以知名作品翻译为主，中后期辐射到儿童小说、散文等作品的翻译，近年则扩展到小语种译介。

## 海外研究逐步深化

日语学界的许地山研究在上世纪40—60年代以《春桃》为主，70年代开始丰富，80年代出现年谱整理与比较研究；英语学界的许地山研究自上世纪60年代起便注重挖掘许地山小说精神内涵及其价值。

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出现穴山严子《春桃》（1955年）、松井博光《关于落华生的〈春桃〉》（1962年）等论文，将“春桃”视为追求民主的新女性形象。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学者转向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比如今村与志雄的《三十年代的许地山——一个作家、学者的后半生》（1976年），对许地山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及著作进行论述；加藤千代的《许地山记事（一）——平民性和民间传说性》（1980年），尝试用解读民间传说的方法解析许地山作品的艺术结构；代田智明的《许地山——传统与革新》（1981年），以许地山杂文为对象，阐述许地山关于传统和革新的观点。同时，一些日本学者开始整理许地山年谱及资料目录，出现了户崎哲彦的《许地山年谱》（1980年）、饭塚朗的《落花生管窥》（1987年）、代田智明和松冈纯子的《许地山研究资料（1）许地山关系文献目录》（1988年）等研究资料，为日语学界许地山研究奠定了基础。上世纪80年代后期，松冈纯子的《论〈商人妇〉——以其与泰戈尔的〈在加尔各答途中〉的关联为中心》（1987年）和《〈女国士〉论——与元曲〈薛仁贵荣归故里〉比较》（1988年），或关注许地山小说与印度文学的关系，或挖掘其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渊源，反映出日语学界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如果说日语学界对许地山的研究覆盖面广，那么英语学界的研究特点则是探索力。1961年，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节论述许地山小说，认为“他给他的时代重建精神价值上所作的努力，真不啻一种苦行僧的精神，光凭这点，他就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在文学史上应占得一席之地”。1986年，美国汉学家路易斯·罗宾逊指出，“玉官”象征许地山自身的精神旅程，并展示了其自我认识的成长。他肯定小说的“精神超越”，认为许地山对自我“无私善良”的追求为人类精神提出了一个普适



《落华生的梦——许地山作品集》  
松冈纯子编辑译注

性命题。两位学者对许地山作品精神价值的肯定基本一致。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凯瑟琳·戴安娜·艾莉森·贝利的《补网：许地山小说主题研究》（1985年）是英语学界系统研究许地山小说的一篇硕士论文。该文深入挖掘了许地山作品的精神内涵，指出许地山有着迥异于五四时期浪漫情绪的超然与冷静；对《缀网劳蛛》《命命鸟》《商人妇》《换巢鸾凤》《玉官》《女儿心》《春桃》《归途》等诸多文本进行了大段翻译与细致解读，在比较视野中探究了许地山小说故事结构模式及人物形象的特征；对他的儿童小说《萤灯》《淘金娘》进行了专门论述。此外，作者还探讨了许地山笔下独特的女性形象，指出许地山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其研究深化了许地山在英语学界的影响。

此后，被西方汉学界公认为“中国文学史经典读本”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也指出许地山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独特性。该书认为，许地山“以大量独立原创的思想调和了自己的改革派学问”，使其迥异于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这一观点在英语学界颇有代表性。

考察许地山海外研究的发展过程可见，从介绍性翻译到深入挖掘，由艺术结构到思想内涵，许地山的海外研究逐步深入，其精神品格亦得以传扬。

##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文学作品外，许地山在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亦有精深研究，其学术著作及藏书的海外传播，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许地山是印度文学译介和研究先驱，他于1928年翻译的《孟加拉民间故事》是最早译入中国的印度民间故事；1931年出版的《印度文学》（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撰写的

的小说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呼吁觉醒，前者强调当下。或许是人生阅历比从前更为丰富，周洁茹的这本小说集，情感使用极其克制。书中用句极简，单句成段的情况密集。简短的话语可以中断倾向性的描述，使情感经常被隐藏。作者在行文中有一种奇妙的自信，她从不做多余的解释，充分相信这些场景对于作为知音的读者是可以被解码的。

与书名同名的短篇小说《美丽阁》，主人公阿美“儿子出生，长大，刚开始念港专，老公就走了，老公走了，阿美只能出来工作，若不是老公留了间屋，够母子度日，这后半生，真算不得安稳”。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是这样细碎的白话，没有铺张的场景、环境描写，或者人物的神态、外貌描写，好像在话家常。人一出场就已在生活的链条中行进，经常是第一段交代下时间状态，第二段就开始了动作，第三句就展开对话或心理活动。假如读者有兴趣，似乎随时可以走进小说，参与到其中去。比如《六八二》中的句子：“如果不是管钥匙的同事要锁门，我可以加班到十二点钟的。但他坚持说他今天一定要回家，不能到明天，现在就要锁门。我只好马上下班。”

小说的情节都很淡，经常是由事件的一般叙述或对话引起，不急不缓地顺着主人公的思维，爱对话就对话，爱行走就行走，只在最后，突然的一句话、一个行为、一个感悟，给小说一个浅浅的交代。比如《美丽阁》讲两个稍显落魄的女人的重逢，各自的负担与无奈都被对方记忆和原谅着，但最后阿美的一



西班牙语《春桃》

第一部印度文学史专著。许地山的硕士论文《泛神论思想在印度和中国的发展》（1926年）由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图书馆收藏，部分手稿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收藏。

因战乱等原因，许地山去世后，其藏书辗转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收藏，计有1224册，包括明清善本、清末藏本等，涵盖民俗学、中国史、中西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文史资料，于2019年完成数字化后，译惠学界。

2021年10月24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网站创建的许地山收藏专区正式开通，不仅为海外学者研究许地山提供了便利，更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专区介绍了许地山主要经历、创作及相关研究，将其藏书、藏品门类别类展示。截至2022年3月，5个月内浏览量超11.8万次，下载量达280万次，使用此专区的学者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李淦林教授认为，从许地山“在相应学术领域的开拓性贡献来看，其学者身份其实更应世所尊崇。”然而，由于许地山英年早逝，许多资料散失海外，其学术业绩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幸运的是，今年5月21日，闽台区域研究中心许地山研究所挂牌成立，该所汇集多所高校专家学者，并聘任许地山侄孙许钢为顾问，旨在对许地山散落各处（包括海外）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推动《许地山全集》编辑出版，搭建起沟通两岸三地及海外的文化交流平台。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许地山求实、奉献、牺牲的精神品格也将在当下日益彰显。

（本文作者系华北科技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配图由许地山侄孙许钢提供）

句“你给自己挣了个明天”，却让这充满负重感的一场重逢突然欢愉起来。《51区》讲述的是在美国内华达州，“我”与珍妮花汽车胎爆的故事。主人公突然发现歇脚的餐厅外就是传说中的“51区外星人中心”，于是两人开始了关于外星世界和人生的对话。《美丽阁》中的短篇，需要读者保持高度的凝神，在这种看似寡淡的闲谈中复习自己人生中的点点滴滴，这是小说一种独特的“渗透性”。

此外，收录集中的还有《盐田梓》，讲述了外地人在香港一个叫盐田梓的地方与人发生口角的插曲，抒发了异乡人的游离之感。《布鲁克林动物园》则讲述“我”与巴士司机共同分享间接的美国经验，在远方畅想着更远的远方。整体而言，周洁茹的这些小说一直保持着这种流动性、瞬时性与日常性。它拒绝刻意营造情节，更像一个Vlog。在这些或感动、或感伤或天马行空的记忆里，作者保持了自己文字的青春之感——通过对庸常的渗透使庸常无效，重新发现自己的敏感，并让自己的记忆绽放出足够动人的光芒。

从内地到美国再到香港，周洁茹的小说有着流动性所带来的青春气息，也有着隐藏不住的超脱与无言。当然，也有了一种倦于修饰的感觉。不过，作者究竟是已经到达了“天然去雕饰”的境界，还是过分的简约使率真变为随性，这恐怕有待读者去评判。不妨跳出这本书，去思考一个问题——日常生活美学将会走向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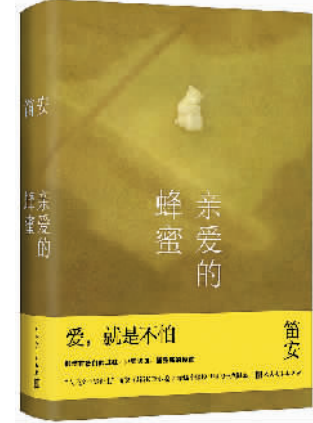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

成为母亲以后，我经常想一个问题，大人和小孩之间，抛开爱、责任、义务，有没有可能存在真正的友谊？虽然身为母亲，但我并不奢望成为孩子最好的朋友——扪心自问，我也不想和我妈做朋友，母女之间总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代沟。我只希望，能和女儿建立真正的信任。那么友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生呢？

我最新的小说《亲爱的蜂蜜》（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在探讨这件事。书中的男主角叫大熊，如果以他的口吻，整本小说用一句话便可概括——蜂蜜，你好，我爱上了你的妈妈，现在我想成为你的朋友，可以吗？大熊的恋爱对象是一位单身妈妈，和女儿蜂蜜生活在一起，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个起初被认为会阻碍这段恋情的小孩，竟让两位成年人都获得了珍贵的成长。母女之间的关系，比友谊复杂太多，但是大熊这个半途闯入者，却跟小女孩蜂蜜成了真正的朋友。因为他发现，当他试图了解蜂蜜的时候，其实是在试着用一个4岁小朋友的眼睛看世界——这种感觉很好，他获得了全新的视角，对自己过往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大熊在保护蜂蜜，蜂蜜同时治愈了大熊。

自我而言，三言两语解释自己刚刚完成的小说，是一件困难的事。就连解释它的创作意图，都几乎变得不可能——因为作品一旦完成，文本的意义是大于作者本人意志的。我只能尽力解释一下，小说有哪些我生活中的影子。我女儿现在8岁，与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让我想起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些连事情都称不上，是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某个瞬间、某种错觉、某些难以形诸语言的属于孩子的感受，以及某些时刻也许只有我才能闻见的气味……如果不是她的小手按下了这个开关，我恐怕不会知道我原来一直记得这些。童年时代的我在某种触发之下苏醒，“她”似乎藏在我意识的某处，与我的女儿遥遥相望；“她”常常一闪身就跑远了，所以我总是来不及和“她”打招呼。但是我非常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有机会重新面对往昔的自己。

这才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我把这个探讨人生的任务交给了男



《亲爱的蜂蜜》 笛安

## 学界聚焦中国叙事与世界华文文学

本报电（王诗霖）近日，“现代中国叙事与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协办，《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编辑部承办，来自全国科研机构、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研讨会主旨发言围绕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总体性理论建构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定位等话题展开。暨南大学教授蒋述卓从文化叙事视角、人物文化身份等维度切入，结合穆紫荆的《醉太切》，深入探讨了海外华文文学文化叙事的杂糅性。山东大学教授黄万华从“共同体”一词谈起，剖析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认为人类在历史渊源、现实利益和未

◎创作谈

## 关于蜂蜜与熊的相遇

笛安

主角大熊。我自然知道，养大一个“人类幼崽”，其间五味杂陈。尤其是“自我实现”的诉求，与“母亲的职责”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很多女性需要面对的问题——我可不想在这个故事里过多讨论它，因为我得说到底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也许残酷，但是我没有兴趣编造所谓“平衡”的神话。我只不过想讲讲，当我们从精神层面，将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孩平等地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为什么不能平等呢？在浩瀚宇宙面前，“大人”比“小孩”早出生的那几十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至此，我允许自己满足地说，文本的意义是大于作者本人意志的。我只能尽力解释一下，小说有哪些我生活中的影子。我女儿现在8岁，与她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让我想起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有些连事情都称不上，是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某个瞬间、某种错觉、某些难以形诸语言的属于孩子的感受，以及某些时刻也许只有我才能闻见的气味……如果不是她的小手按下了这个开关，我恐怕不会知道我原来一直记得这些。童年时代的我在某种触发之下苏醒，“她”似乎藏在我意识的某处，与我的女儿遥遥相望；“她”常常一闪身就跑远了，所以我总是来不及和“她”打招呼。但是我非常感谢命运，让我成为了一个母亲，有机会重新面对往昔的自己。

《亲爱的蜂蜜》写得非常顺畅，原本我手在做另一个缓慢磨人的工作，沉重的负担间隙，我觉得不如写一个轻松愉快的中篇小说调剂一下，蜂蜜和大熊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为了让自己始终在写作中保持愉快，我甚至放弃了制造复杂的人物冲突，我只想塑造一段虽然会是虚构的，但是有人看了会相信的人生。写到信马由缰的时候，我便随自己去，3万字的预设很快打破了，接着就是6万字、9万字——最终形成了目前13万字的样子。

有些作品从写作开始的那一刻就想与读者交流什么，但有些并不是。我必须承认，这篇小说是写给我自己的。不过幸运的是，确有读者喜欢蜂蜜小朋友，并且相信蜂蜜和大熊真的生活在北京的某个角落。对我来说，这已足够。大熊会笨拙地牵着蜂蜜的小手，迎着黄昏美好的夕阳，慢慢地沿人行道走着，走着。至于终点在哪儿，其实我也很想知道。